

比批評更重要的是理解

● 許紀霖

關於後現代文化與後殖民文化問題，如今不僅在全球、而且在中國大陸也引起了知識界廣泛的注目和討論。對於如何解讀這樣一種知識和文化思潮現象，自然是一個饒有興味的題目。《二十一世紀》今年2月號（總第27期）發表的趙毅衡和徐賁兩位先生的文章，提供了海外學者獨特的視角和理解，其中有不少深刻的洞見（尤其是徐賁一文），但也有很多的看法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特別是趙毅衡札記式的論文，在情緒激奮的表達背後充滿着思辨的混亂。作為對這一問題深表關懷的大陸學人，我本來早就有意動筆，談談大陸這幾年的後現代／後殖民文化現象，趁這次回應趙先生文章的機會，我想略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看法。

未經反思的價值是不真實的

不管我們對中國的後現代文化思潮持甚麼樣的價值取向，在表明自身

的態度、即使是批評態度之前，首先對這一現象採取一種客觀公正的理解，總是不會錯的，而且這也是文化批評的起碼職業道德。

可惜的是，趙毅衡對大陸的後現代文化思潮先作了一個價值上的判案，認定這是一個「強大的新保守主義思潮」，甚至在行文中索性將這兩者等同，然後歷數了它的所謂三個表徵：對80年代文化熱的懺悔、回歸傳統文化和自我唾棄精英責任轉而向俗文化認同。關於大陸的後現代思潮是否是一種新保守主義，而新保守主義是否以「後學」作為自己的學理依據這些暫且不論，讓我們先來看一看為這一思潮作定位的三種描述性的表徵。因為一旦研究的對象張冠李戴，似是而非，整個立論的基礎也就岌岌可危了。

在三種表徵裏面，後面兩種可以說完全是誤讀（這一問題下面再討論），唯一沾得了邊的大概就數第一種對80年代文化熱的懺悔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得不在這一問題上多停

趙毅衡和徐賁兩位先生的文章，提供了海外學者獨特的視角和理解，但也有很多的看法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特別是趙毅衡札記式的論文，在情緒激奮的表達背後充滿着思辨的混亂。

留一會，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如何理解大陸後現代思潮得以發生的重要問題。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1989年對理解大陸後現代思潮是十分關鍵的一年，就像1968年是理解西方後現代文化的重要年份一樣。1968年席捲歐美的文化抗議運動改變了整個西方學術思潮的現代走向，當代西方的後現代大師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奧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傑姆遜(Fredric Jameson)等人的思想軌迹，無一不是從68年運動發端的。只是，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置換了戰場，從校園街頭和社會政治領域轉移到了學術的象牙塔內，以語言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語言。同樣，大陸的後現代思潮也是將1989年作為自己的精神出發點。人們一定記得，作為一種學理，西方的後現代哲學、後現代文化和後現代藝術理論早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中就已經被介紹進大陸的學術界。在《現代外國哲學》、《文化：中國與世界》等書刊雜誌上，西方的後現代大師的名字早已為專業讀者耳熟能詳。不過，在當時的文化熱中，知識界的主流話語是以西方的現代性為訴求的文化啟蒙和現代化思潮，當時後現代的影響僅僅限於知識界的專業圈中，並未形成廣泛的知識—文化思潮。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不僅使文化熱驟然退潮，而且也使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熱情開始衰退。在一場全社會的悲劇發生之後，人們除了道德的譴責之外，更重要的是想通過歷史的反思來探究為甚麼會發生這樣一場毫無妥協餘地的直接對抗。在思想的層面上，需要追問的是在現代中國，究

竟是甚麼樣的話語範式規範着中國社會上上下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選擇。而這樣一種嚴肅的追問，勢必要涉及到80年代作為知識份子精神運動的文化熱，就像檢討法國大革命總是要回溯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一樣。自然，在大陸的語境之下，這樣的追問只能換算為某種歷史意識或以抽象的學術話語得以進行。即使如此，也並不一定妨礙討論的嚴肅性和真誠性。

大陸知識界對89年以及文化熱的思想清算，可以說是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的。第一個是社會／歷史層面上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大討論。這一討論的觸發點是余英時教授的那篇〈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的著名演講。討論的話題儘管是在歷史的層面上展開，但這一話題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畢竟是以89年為心理背景，它的真正問題在於：究竟誰該對89年乃至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悲劇負責？是激進主義呢，還是保守主義？或者說是兩者共同的責任^①？與此平行的第二個層面，就是哲學／文化層面上後現代思潮的崛起。正如前述，西方的後現代學說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中就已經同大陸的知識份子見面，之所以未形成波瀾，乃是當時大陸還匱乏接受它的的語境和心理。89年以後，當人們從當下的悲劇，開始反思過去自己所接受的觀念、價值和思維範式是否具有邏輯和歷史的真實性，是否是一種思維中的虛妄時，西方的後現代文化理論就不期而遇地成為知識份子自我反思過程中極具新鮮感和啟發力的思想資源。

89年以後大陸知識份子對後現代思潮的注目，首先是從文學領域開始

大陸知識界對89年以及文化熱的思想清算，可以說是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的。第一個是社會／歷史層面上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大討論；第二個是哲學／文化層面上後現代思潮的崛起。

的。1990年知識界普遍關注的是兩個作家的作品，一個是捷克的昆德拉(Milan Kundera)，另一個是國內的王朔。人們之所以對這兩個藝術風格迥異的作家同時發生了興趣，乃在於他們的作品中隱含的後現代思潮的基本元素對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真實性的懷疑和對生活意義的拆解。從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開始，一部分知識份子對西方的後現代文化思潮發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這種關懷在89年以後的語境中實際上是想解開下述思想死結：為甚麼89年事件中對立的雙方都表現出一種同構性的思維邏輯，都自以為真理在握，代表着正義，掌握着道德的制高點？為甚麼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往往不自覺地以一種一元化的、獨斷論的整體主義思維方式思考問題？中國的政治專制主義又以甚麼樣的話語霸權作為自己學理上的合法性依據？進而，所有整體性的宏大敘事對價值、意義的烏托邦承諾是否從根柢上來說是虛妄的，是現代悲劇的思想淵源所在？

無論是社會／歷史層面的反思，還是哲學／文化層面的追問，都不可能繞開80年代文化熱這一直接陶鑄了當代大陸知識份子思想模式的精神運動。文化熱對於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自然有其不可抹殺的意義，然而，它所形成的啟蒙話語和現代性神話依然是需要追問的。這就是90年代後現代思潮在中國的發生學意義。隨便說說，後現代思潮並非如海內外一些評論者所判定的那樣是一場橫向移植的矯情運動，是過於超前的思想消費。所有這些對後現代的議論不是出於對後現代思潮的誤讀，就是淺薄的無知。因為他們對現代思潮與後現代思潮的關係望文生義般地誤解

為時間上的先後序列，於是認定後現代在現代性遠未實現的中國大陸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進口奢侈品。事實上，我們在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利奧塔關於現代性的爭論中可以看到，現代性與後現代的分歧主要在於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堅持任何形式的元敘事。後現代的立場恰恰在於消解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整體性話語，並指出其虛妄性和獨斷性。正是後現代思潮具有這樣的批判功能，因此在整體主義獨斷論話語一直是知識界和社會日常生活主流意識形態的當代中國，才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反叛熱情，才會成為知識份子反思89年事件、反思80年代文化熱、進而反思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重要思想資源②。

不管我們對後現代文化理論持甚麼樣的價值立場，只要對中國的問題有着比較貼切的理解，或者對不同的知識系統抱有一種開放的對話願望，我們總得承認，後現代思潮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在理論還是現實意義上都是極具挑戰性的：無論你贊同與否，都值得認真的對待和嚴肅的回應。也許後現代思潮反思以後得出的結論過於偏激，走向了令人憂慮的價值虛無主義立場，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本身就沒有意義，就是荒謬的。事實上，自從後現代哲學／文化思潮產生之後，所有西方當代的重要理論都無法迴避後現代理論所提出的問題，而且正是在回應後者的理論挑戰、在與後者的對話過程中進一步捍衛了自身的立場。哈貝馬斯對理性的捍衛就是這樣，他的形式化的新理性主義立場是充分經過後現代哲學洗禮的，比較起傳統的理性主義，對後現代具有更強的回應能力。

趙毅衡先生儘管可以堅持自己的固有立場和價值觀，但不能無視後現代文化思潮所提出的問題，與其情緒激動地指責後現代思潮，倒不如冷靜地研究一下後者所提出的問題，作出自己的回應。

因此，趙毅衡先生儘管可以堅持自己的固有立場和價值觀，但不能無視後現代文化思潮所提出的問題——不管你是否承認，這些問題已經實實在在地存在於當下中國的生存境遇之中，與其情緒激動地指責後現代思潮，倒不如冷靜地研究一下後者所提出的問題，作出自己的回應。按照趙先生的學術素養，本來他是有足夠的能力回應這些問題的。當你對對方的問題作出回應時，自然離不開對自身立場的反思，只有經過反思的價值才是真正值得捍衛的價值。

後現代不等於新保守

如果說趙毅衡描述的三種表述中第一種意思還差離不多的話（儘管「懺悔自責」一詞並不準確，應該說「反思」更確切一些），那麼後兩種表述則完全是令人遺憾的誤讀。

先來看一看所謂的「回歸傳統文化」。自從90年代以來，在大陸知識界的確出現了一種新國學的學術思潮（但其勢頭遠遠未像趙毅衡所說的到了「成為近年學術的中堅」地步），這些思潮的代表人物既有老一輩的學人，也有學界新秀。說他們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自然也是成立的，至少新國學中的一部分學者也是樂意擔當這一名分的。在90年代的學術語境之下，文化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不同於80年代的大陸，不僅沒有了原來的貶義，而且還不無褒揚之意。因為人們發現近代思想史、學術史中曾經被指責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人物大都是一些很有學問、目光深刻的大家。然而一定要說新國學與「後學」（無論是後現代還是後殖民）有甚麼瓜葛的話，就

有點牛頭對不上馬嘴了。

大陸後現代文化批評的領軍人物張頤武先生曾經按照他的後殖民文化批評理論將新國學也劃入所謂的「後國學」一類^③。不去說這劃分是否有問題，至少張頤武指認的「後現代現象」與趙毅衡所批評的「後現代現象」不是同一個層次的現象（關於這兩種現象的區別我下面將詳細分疏）。不管怎樣說，當代中國的新國學與後現代無論從知識資源還是價值趨向上都沒有絲毫的共通性。後現代的知識資源來自當代西方，而新國學要續上的卻是被中斷了的以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為代表的近代國學傳統：後現代思潮力圖斬斷與歷史的聯繫，消解所有的整體性元話語，而新國學希望的卻是通過與傳統的接榫，重建一種學術元規範。於是，問題就變得如此有趣，如果說「回歸傳統文化」指的是新國學思潮，那麼它與趙毅衡所批評的對象「後學」並無實質性的關聯。而真正的「後學」又是決無「回歸傳統文化」意願的，即使是後殖民文化批評，其立足點也在反抗西方的文化殖民，雖然也在說本土化，但這「本土」是否就是傳統文化，也是語焉不詳的東西。至少後殖民文化理論本身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渾身充滿着洋味，而聞不到絲毫的鄉土氣。

再談第三種表徵「自我唾棄精英地位或責任，轉而向民間文化一俗文化認同」，據趙毅衡分析，這是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後現代思潮）最重要的特徵。也就是在這點上，趙先生的思路陷入了不可思議的混亂之中。

在大陸知識界，當講到「後現代」這一概念時，在語用學的意義上實際上分為兩組截然不同的範疇，即後現代的話語與後現代的現象。所謂後現

自從90年代以來，大陸知識界的確出現了一種新國學的學術思潮，說他們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自然也是成立的。然而一定要說新國學與「後學」有甚麼瓜葛的話，就有點牛頭對不上馬嘴了。

代話語，指的是知識界中以西方的後現代哲學—文化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或研究方法。自然，其中也有兩種不同的層面。

第一種是學理的層面，指的是在8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的對西方後現代思潮的學理性譯介和研究。89年以後，這樣的工作不僅沒有停止，而且更深入、廣泛和全面了，開始在知識界形成熱點，北京大學出版社甚至還專門出版了有關後現代主義的中外文論研究系列。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從事這一研究的學者並不一定贊成後現代的哲學—文化觀點，他們只是遵循學術規範的要求，盡量以一種價值中立的知識態度客觀地介紹和理解加達默爾(Hans Georg Gadamer)、德里達、福柯、利奧塔、羅蒂(Richard Rorty)、傑姆遜等人的學說^④。這些嚴肅的學術工作為後現代在大陸成為文化時尚提供了學理的資源。但他們的影響僅僅局限於專業圈之內。

另一種是批評的層面，是指運用後現代理論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各種文本所進行的闡釋性文化批評。這是近一、兩年來大陸文化界出現的新氣象，也是「後現代」成為時尚的最顯著的標誌。這樣的文化批評，覆蓋了文學、藝術、美術、影視、建築、戲劇等各種文化領域，具有相當大的衝擊波和新鮮感，以至於給世人一種感覺，以為一個全新的後現代文化的時代到來了。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後現代衝擊波中，北京的張頤武和陳曉明這兩位被圈內人士戲稱為「張後主」和「陳後主」的青年評論家扮演了最引人注目的角色^⑤。比較起上述第一類的純學者，他們的學理根柢也許要淺一些，卻敢於活學活用，大膽地將西方

的後現代理論創造性地運用於解讀、裁剪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批評實踐，在漢語文化界推出了一套完整的後現代／後殖民文化批評話語，其操作之熟練、批評之鋒利，言說之通俗，足以吹縵一池春水、掀動大江南北。與前述的專業研究者不同，他們被世人視作中國的後現代思潮的通俗化代表。

與上述兩種後現代話語截然不同的，是那些後現代文化批評者所指認的所謂後現代現象。陳曉明談到，他們指稱的後現代現象是指兩個層面的東西，一個是先鋒性、實驗性的後現代文學藝術，比如大陸的余華、格非、孫甘露、蘇童、葉兆言等人的作品就被視作後現代文學；另一個是指大眾性、通俗性、商業性的流行作品，比如王朔的小說、MTV、卡拉OK、通俗影視劇、流行歌曲等等^⑥。作為後現代話語的操作者，他們對自己所指認的後現代現象，特別是流行藝術，儘管承認是後現代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價值取向上並不一定認同，相反地，作為一個「文化的觀望者」(張頤武語)，他們賦予自己的使命就是以後現代的批評工具無情地解構這些大眾文本，就像他們對第五代導演、《北京人在紐約》的尖銳批評一樣。

趙毅衡先生大概因為過於義憤填膺，還來不及分辨後現代話語與後現代話語所指稱的現象之間的區別，就將所有的後現代文化一股腦兒指責為「向俗文化認同」，以至自己指責完了也覺得有點迷糊：怎麼那些理論上的投降者在對待具體的通俗文本上又是那般地不留情面？如果真的照他自身的邏輯推理，以研究後現代、先鋒藝術著稱的趙先生恐怕也難免被錯認為

在大陸知識界，當講到「後現代」這一概念時，在語用學的意義上實際上分為兩組截然不同的範疇，即後現代的話語與後現代的現象。

向俗文化、新保守主義認同了。

最後讓我們回到對後現代思潮「新保守主義」的指控。正如前幾年的激進—保守討論中已經碰到過的那樣，在大陸的語境下何為激進、何為保守已經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對界定激進或保守的那個坐標的把握不定。趙毅衡先生在提出上述指控時並沒有對自己的坐標或理由作出說明，從行文來看，似乎對80年代文化熱中好不容易重建的精英文化或現代性話語提出質疑的，大概都屬於「新保守主義」的行列。暫且不說這種簡單的貼標籤辦法是多麼的「傳統」、教條，即使有必要給大陸後現代思潮定性，趙先生恐怕也是貼錯了標籤。從大陸知識界一般的意見來看，大都認為後現代思潮是一種相當激進（如果一定要用激進／保守來劃分的話）的思潮，因為它在拒斥宏大敘事的同時，將人類文化幾千年遺傳下來的意義系統、價值基礎一併顛覆了。同樣，中國的後現代思潮在有效地批判了獨斷論的主流話語的同時，也走向了相對主義的極端。當然，從不同的坐標來看，你可以說它是激進的，也可以說它是保守的。事實上，激進與保守從來都是一個分幣的兩面，它只是一個定性的範疇，而不是分析的範疇。對於大陸目前出現的後現代思潮，問題不在於如何為它定性，而是如何分析解讀它。只有充分理解了其社會／知識發生學的意義以及內在的話語系統，批判才可能是有的放矢的。遺憾的是，為激奮情緒所擺布的趙毅衡先生在還未搞清大陸後現代東南西北的情況下，就急急為它定性，並以此作為分析的前提，自然會鬧出張冠李戴的笑話了。

儘管如此，我對趙毅衡先生仍懷

着十分的尊敬，因為這些年來在海內外雜誌上讀過他許多論述後現代和先鋒藝術的精彩文字，可謂受益頗多。但這次趙先生的大作卻令人十分失望。我本人不是後現代思潮中人，而且對大陸的後現代／後殖民文化思潮有過相當激烈的批評^⑦。即使如此，我仍然認為，後現代思潮在大陸的出現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它所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過去80年代文化熱的過來人所不曾意識到的，如今由後現代思潮提出來了，儘管他們解決這一問題的路徑在我看來未必對，但至少促使我們去反思我們過去以為是自明、其實未必自明、還需要深入論證和辯護

伴隨經濟發展而在國內興起的商業俗文化，被後現代文化批評者稱為後現代現象。



的理念，諸如理性、現代性、整體性以及意義、價值等等。

本來，海外的學者應該比國內的學者更有條件做這一回應性的工作，但要做好也不容易（隨便提一句，徐賁先生就作得比較好），起碼要對大陸89年以來的語境變化以及思潮的內在理路有個大致不差的了解，才能進行有效的學術批評。海內外學者本來各有長短，海外學者擁有寬闊的學術視野和豐富的學理資源，但對大陸的語境缺乏直接感受；而大陸學者又恰恰倒過來。這就需要海內外學人本着真誠的願望、真實的了解和正常的表達互相構通，在跨越語境的對話中達到視界的交融。《二十一世紀》雜誌這些年所做的正是這樣的溝通海內外的工作，我們應該以自己的理智和真誠珍視這樣的交流。

註釋

① 余英時的演講是在89年之前發表的，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直到89年以後，當人們痛定思痛，開始反思之際，余英時的演講才在大陸知識份子中廣泛流傳開來，並成為爭論的中心話題之一。

② 本文限於篇幅，主要分析的僅僅是後現代在90年代中國發生的外在的社會學因素，除此之外，還有文化學術發展自身的內部原因。比如張頤武就談到，80年代中期以後，當出現了一批先鋒派、實驗派和新寫實主義的小說之後，批評界對此普遍感到批評工具的缺乏，而後現代這套代碼的出現，恰恰為解讀這些作品提供了新的視野。見陳曉明等：〈後現代：文化的擴張與錯位〉，《上海文學》，1994年第3期。

③ 張頤武：〈「分裂」與「轉移」：中國「後新時期」文化轉型的現實圖景〉，《東方》，1994年第2期。

④ 比如，目前大陸在後現代研究方面較有影響的學者葉秀山和王岳川，他們對後現代哲學顯然保持着一種冷靜的、批判的、反思的知識距離。見葉秀山：〈論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沒有時尚的時代？〉，《讀書》，1994年第2期；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⑤ 1994年上半年，當你翻開每一本大陸稍有影響的文化思想性雜誌的目錄，都能發現有陳曉明和張頤武兩位鼓盪「後現代」、「後殖民」、「後寓言」、「後新時期」……的大作。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論文見陳曉明等：〈後現代：文化的擴張與錯位〉，《上海文學》，1994年第3期；〈東方主義與後殖民文化〉，《鍾山》，1994年第1期。張頤武：〈新空間：神話時代的消失〉，《上海文化》，1994年第2期；〈「分裂」與「轉移」：中國「後新時期」文化轉型的現實圖景〉，《東方》，1994年第2期；〈「現代性」的終結：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3期；〈走向「後寓言」時代〉，《上海文學》，1994年第8期。

⑥ 見前引陳曉明等：〈後現代：文化的擴張與錯位〉。

⑦ 見許紀霖：〈後殖民文化批評面面觀〉，《東方》，1994年第5期；〈現代性是否真的終結〉，《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

許紀霖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化、現代化變遷和知識份子的研究，在海內外發表有多種著作、論文和評論。